

# 普通話在澳門：歷史與現狀

閻喜\*

推廣普通話是強化民族共同語的過程。中華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追求言文一致，語言統一，不但有利於政治、經濟、文教活動的推展，而且有利於全民族的溝通了解、交流合作、團結與認同，是民族的大事，是統一大業的一個組成部分。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為這一理想努力不懈，成績不能低估。<sup>1</sup>

## 一、引言

1999年12月20日，葡萄牙殖民地澳門停止存在，與此同時，澳門特別行政區誕生。澳門半島，連同氹仔，路環兩個島嶼，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國兩制”方針的指導下，澳門歷史揭開了嶄新的一頁。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語言，普通話在澳門也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許多學者對澳門的普通話從語言態度、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等多角度進行了研究。例如在語言態度方面Mann and Wong綜合使用問卷和訪談法調查來自澳門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共72名師生。研究結果顯示在澳門各領域中，人們重視粵語和英語，普通話排第二位，而葡語排最後。<sup>2</sup> Young研究澳門回歸八年以後學生的語言態度和語言偏好。作者使用問卷對185名就讀於澳門科技大學的澳門本地學生進行調查，調查發現在對“學生最喜歡的語言”這一問題的回答上，粵語居首位，然後依次是英語，普通話和葡語。<sup>3</sup> 關於澳門回歸後的語言變化，大多數學生認為普通話和英語比以前使用地更頻繁。在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方面，許多學者探討了普通話和廣東話在澳門的關係，例如程祥徽堅持認為普通話應該是澳門的官方語言<sup>4</sup>，而梁淑雯認為以普通話作為正式中文口語缺乏依據，強調普粵共存<sup>5</sup>。本文從普通話在澳門的發展歷史及其使用現狀，以及普通話在澳

門的教學、研究、教材研發等多角度探討普通話在澳門的普及與推廣，希望本研究能對澳門的語言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 二、普通話在澳門：歷史

劉羨冰在其著作《澳門教育史》一書中將澳門普通話教育分為四個歷史階段：官話、京話時期，國語、國音時期，普通話時期，文化認同的新時期。作者認為普通話在澳門的推廣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高潮，即：20世紀30年代抗日戰爭時期，20世紀40年代末解放前後，20世紀80年代末中文成為澳門官方語言的前前後後，並指出這三次高潮與當時的政治浪潮緊密相關。下面簡要地回顧一下普通話在澳門的推廣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高潮。

### (一) 第一次高潮：20世紀30年代抗日戰爭

1937年，從北京到澳門的知識分子把國語推廣到澳門，其中著名的有關玉書、何仲恭、王菊如等。1937年後，從廣州來澳的知識分子也在澳門開展國語運動。其中最負盛名的是黃耀樞。劉羨冰詳細地介紹了黃氏教學及推廣國語的特徵。

在《口述歷史：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一書中，受訪者黃炳泉介紹了澳門在抗日戰爭時期組織成立的修社同學會。修社同學會旨在從學習國語入手捍衛民族文化，通過各種文娛活動，如唱歌、話劇、體育、讀書會來提高學生的愛國意識。修社同學會成為當時澳門社會一個頗有影響力的愛國團體。<sup>6</sup>

### (二) 第二次高潮：20世紀40年代末解放前後 新中國成立後，隨着內地普通話學習高潮的掀

\*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英文系博士研究生

起，澳門本地也隨之掀起了學習普通話的高潮。抗戰結束後，一個由部分前修社成員為主的新的團體青友會成立，並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人，成立了一個以國語演唱中華民族的傳統民歌為主的合唱團，最終演變成了今天的青年協會。

### (三) 第三次高潮：20 世紀 80 年代末中文成爲澳門官方語言的前後

1987 年《中葡聯合聲明》明確規定，在建立特別行政區後，政府機關、立法機關和法院使用的主要語文是中文。1991 年 12 月葡政府頒佈法令，承認中文在澳門具有與葡文相等的官方地位。1993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對澳門的語文作了原則性的規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以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這樣就從法律上確定了中文官方的地位。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澳門迎來了第三次普通話學習的高潮。如前文提到的修社同學會繼續在澳門開辦了多屆國語班來推廣普通話。盛炎介紹了澳門回歸前全社會學習普通話的情景：“隨着“九九”的臨近，這種全社會的普通話學習發展迅速，如火如荼。中，小學增設普通話課程的越來越多，普通話教師的需求量越來越大。中華教育會數年來，一直堅持一年一次的普通話朗誦比賽，而且越辦越好；澳門中國語文學會跟香港、廣東地區聯合舉辦多次普通話交流營，屬下的普通話研習社成立五年來，團結了一批普通話學習積極分子，自覺地學習普通話，爲普通話培訓培養了師資；澳門理工學院跟澳門電視台合作，開辦了不同類型的普通話電視課程，吸引了不少觀眾。這類課程已開辦兩年，出版了一套普通話課本，還有錄像帶。一些教師自費到內地參加普通話培訓，取得普通話教師資格。濠江中學一直堅持用普通話教授語文課，爲適應新的形勢，教育暨青年司跟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合作，從去年開始，舉辦普通話教師培訓班，同時組織人力編寫中、小學普通話教學大綱。”<sup>7</sup>

## 三、普通話在澳門的使用情況

Nortier 認爲雙語與多語研究首先需要對語言使用者和語言使用情況有一個清楚的瞭解，這可以借助宏觀層次的人口普查和樣本調查，中間層次的問卷調查，以及微觀層面的觀察法。<sup>8</sup> 許多學者都利用宏觀層次和中間層次的調查對多語現象進行研究。<sup>9</sup>

對於普通話在澳門的使用情況，目前還沒有專門的調查研究，主要數據多來自於澳門近年來的人口普查，例如澳門 1991 年和 2001 年人口普查以及 1996 年和 2006 年中期人口普查中都設有單獨的項目調查受訪者的語言使用情況。

表 1 澳門居住人口日常用語言使用情況(單位：%)

日常用語	1991	1996	2001	2006
廣東話	85.8	87.1	87.9	85.7
普通話	1.2	1.2	1.6	3.2
其他中國方言	9.6	7.8	7.6	6.7
葡語	1.8	1.8	0.7	0.6
英語	0.5	0.8	0.7	1.5
其他	1.1	1.3	1.7	2.3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91 澳門人口普查》、《96 中期人口統計總體結果》、《2001 人口普查總體結果》和《2006 中期人口統計總體結果》，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各年份。

表 1 是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發佈的最近四次人口普查中有關家庭常用語言所佔比例而制的。從該表可以看出，我們注意到廣東話仍然居於主導地位，在四次人口普查中廣東話所佔比例都達到了 85% 以上，體現出廣東話在澳門具有較強的影響力。但與此同時，令人可喜的是，普通話作爲日常用語言在澳門居住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已經從 1991 年的 1.2% 上升到 2006 年的 3.2%，增加了兩個百分比。

此外，根據 2006 年澳門中期人口普查結果，除了家中常用語言，有 54.0% 的居住人口表示可流利使用另一種/多種語言與人溝通，其中以懂普通話的比例最高，達到 65.3%。按常用語言及其他可使用語言合計，發現 3 歲及以上居住人口中，91.9% 懂廣州話，38.5% 能使用普通話。

表 1 主要反映了澳門人在日常生活，即家庭領域的語言使用情況，並沒有涉及普通話在澳門其他領域的普及情況，澳門行政暨公職局最近二十多年來每年都對澳門的公共行政人力資源進行調查統計，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對公共行政工作人員語言知識的調查。我們可以從這些調查中瞭解澳門行政領域工作人員的語言掌握情況。

澳門過渡時期的三大任務之一是公務員本地化。而公務員的語言使用情況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澳門公務員本地化的成果。表 2 是根據澳門行政暨公職局發佈的四次人力資源報告中有關公共行政工作人員語言知識情況繪制而成的。從表 2 可以看出，近 20 年來澳門公共行政人員的語言知識情況有幾個顯著的變

化，比如廣東話普及率從 1991 年的 70.72% 上升至 97.8%，而更為顯著的是普通話的普及率已經從 1991 年的 30.00% 上升到 2006 年的 68.1%，上升了差不多四成，這與澳門的行政部門大力舉辦各種普通話培訓班，澳門行政人員對普通話的重視並積極參加普通話培訓班等多種因素都是分不開的。

表 2 澳門公共行政人員語言知識情況(單位：%)

年份 語言	1991	1996	2001	2006
廣東話	70.72	87.71	96.36	97.8
普通話	30.00	54.68	65.47	68.1
葡萄牙語	45.42	54.56	46.20	43.8
英語	41.76	59.63	56.17	58.9

資料來源：澳門行政暨公職局：《91 年澳門公共行政之人力資源》、《96 年澳門公共行政之人力資源》、《2001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報告》、《2006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報告》，澳門：澳門行政公職局，各年份。

除了上面所說的有關普通話在澳門家庭領域，行政領域的使用情況外，還有一項調查涉及澳門居民普

通話掌握情況。2005 年由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立項統籌，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負責技術支援，澳門基金會參與合辦的大型“澳門居民素質調查”，通過大規模的問卷調查來全面瞭解澳門居民的素質現狀。其中涉及澳門居民對普通話的掌握情況。

表 3 展示了 2005 年“澳門居民素質調查”中有關澳門各行業對普通話的掌握情況，總的來說，會說普通話的受訪者佔到總人數的 40.4%，而表示會說一點普通話的人達到 44.5%，只有 15% 的受訪者不會說普通話。從表 3 可以看出，專業人士會說普通話的比例是最高的，達到 57.7%，其次是立法機關成員、公共行政高級官員、社團領導人員、企業領導人及經理，會說普通話的佔 48.0%，排在第三位的是文員，佔 44.9%。排在中間三位的依次為：漁農業熟練工作者 (40.0%)，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38.8%)，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38.2%)，而排在最後三位的是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30.6%)，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 (26.2%)，非技術工人(22.6%)。

表 3 澳門居民對普通話的掌握情況

職業	掌握情況			人數
	會(%)	會一點(%)	不會(%)	
立法機關成員、公共行政高級官員、社團領導人員、企業領導人及經理	48.0	42.7	9.3	75
專業人士	57.7	28.9	13.4	97
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	38.2	44.6	17.2	204
文員	44.9	48.8	6.3	127
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	38.8	50.5	10.7	281
漁農業熟練工作者	40.0	0.0	60.0	5
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	26.2	35.7	38.1	42
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	30.6	48.6	20.8	72
非技術工人	22.6	43.5	33.9	124

資料來源：《澳門特區居民素質調查報告 2005》，澳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2006 年，第 22 頁。

如果將會說普通話和會說一點普通話的比例加起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為文員(93.7%)，立法機關成員、公共行政高級官員、社團領導人員、企業領導人及經理(90.7)，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89.3%)。排在中間的是專業人士(86.6%)，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82.8%)，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79.2%)。而排在最後的是非技術工人(66.1%)，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61.9%)和漁農業熟練工作者(40.0%)。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行政領域，經濟領域和服務性行業普通話的掌握水平總體上來說較高，而勞動密集型行業如非技術工人，工業工匠，手工藝工人的普通話掌握水平

相對而言較低。這反映出普通話和人們所從事的職業之間存在着一定的關係。這項調查報告還發現不會說普通話的受訪者有 57%，即一半以上是 50 歲以上的居民。這說明年齡對普通話的普及也有一定的影響。

#### 四、討論

上節中的三個表格從不同角度反映出普通話在澳門的普及程度的提高。下面我們主要討論有哪些因素促成回歸前後普通話普及程度的提高。

### (一) 對祖國認同是普通話推廣的基礎和關鍵

隨着祖國國力的日益強盛，澳門市民對祖國的認同歸屬感也日漸增強，“推普”的關鍵在於澳門人對祖國的認同。中文在澳門官方地位的確立，已經提升了普通話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與威望，不少澳門人選擇普通話這一民族共同語。澳門回歸後開展的澳門學生身份認同調查顯示澳門學生對澳門和中國的認同程度都很高，並有很高的學習普通話的意願。<sup>10</sup> 例如澳門青年研究協會及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2007 年聯合進行了《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顯示有八成以上的學生表示出學好普通話的意願，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相關的國家認同。<sup>11</sup>

### (二) 澳門社會經濟城市快速發展推動全社會推廣普通話

澳門是一個國際旅遊城市，2005 年“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宣佈列入世界遺產，每年來澳門旅遊的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旅遊者上千萬人次。隨着澳門賭權的開放，更多國際知名公司來澳投資，同時也吸引着更多的國內外遊客來澳門旅遊。而內地實行“個人自由行”以來，每年很多內地旅客來澳門觀光旅遊。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經濟局和澳門金融管理局聯合出版的《澳門經濟季刊》(2009 年第三季)，近幾年來，每年都有超過一千多萬的內地旅客來澳，其中個人遊居多，而中國內地旅客的人均消費也遠遠超過歐美、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來澳旅客。面對如此龐大的消費群體，掌握普通話對於澳門旅遊、博彩等相關行業必不可少。同時澳門也是國際會展中心，每年都有一系列的國際會議在這裏舉行，其中使用的主要語言之一是普通話。2003 年，內地與澳門特區政府簽署了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2004 年、2005 年、2006 年又分別簽署了《補充協議》、《補充協議二》和《補充協議三》。澳門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要求全社會普通話水平的提高，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澳門日報》招聘廣告中很多廣告都對應聘者的普通話有明確要求。

### (三) 移民對普通話在澳門使用比例的增加也有一定的影響

黃漢強和程惕潔在 2002 年 7 月至 10 月通過對新來澳門定居的內地移民進行抽樣調查發現，內地新移民的前居地，60-70%集中在廣東，20-30%在福建，其他省區的約佔一成左右。許多中國北方人移民到澳門

或在澳門工作學習初期，由於尚未學會廣東話，他們也傾向於使用普通話作為交流工具。<sup>12</sup>

### (四) 廣東地區語言變遷的影響

陸鏡光和張振江指出“到二十世紀末期，普通話在廣東已經初步普及”。<sup>13</sup> 尤其是深圳和珠海成為普通話主導語言社區，作者認為“深圳和珠海普通話語言社區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義，標誌着在一向是方言的天下的廣東，建立了兩個影響甚大的普通話支撐點。由於有了這兩個基本的、穩定的地域分佈，普通話在經歷了流入、反復之後，終於紮下根來，廣東漢語的三足鼎立的格局，一變而為四分天下，社會語言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sup>14</sup> 澳門與珠海相鄰，兩地之間的人口流動相當頻繁，澳門的社會語言狀況勢必會受到珠海的影響。

### (五) 澳門學者進行大量的普通話教學，研究與測試以及教材編寫的工作

回歸前後，澳門學者對普通話的教學，研究和測試進行了大量的相關工作。如程祥徽分析了在澳門推廣普通話的各種策略，如民間支持和政府支持，建立高素質的教師隊伍，鼓勵學習者敢講以提高信心，重視口頭與書面普通話，因材施教，以及對語言教師自身的要求。<sup>15</sup> 盛炎討論了港澳地區學習普通話的必要性，首先，當今世界語言運用的總體趨勢要求澳門人應該面向全中國，面向全世界，不說普通話會與澳門這個國際城市不符。其次，澳門經濟的持續發展有賴於同海外，內地(包括各種方言區)的聯繫。不學普通話會有很多不便之處。第三，學習普通話有助於對書面語的理解。最後，普通話的使用能擴大溝通能力，提高工作適應性。對於如何培訓普通話，盛炎認為“普通話培訓應該有一個整體規劃，確定近期目標和長期目標，制訂等級標準，採取有效措施，使受訓練的人在規定的時間內達到所要求的標準。”<sup>16</sup> 作者以澳門政府公務員的普通話培訓為例，詳細地介紹了公務員中文培訓的途徑，原則，方法，等級標準，教學大綱的制訂，教材的編寫等多個方面。盛炎對於從那個年齡開設普通話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強調了教師培訓和測試的重要性。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於 1998 年主辦了“普通話(國語)教學國際研討會”，2001 年主辦了“漢語(普通話)教學與測試研討會”。與會者從普通話的教學、測試、教材編寫等多角度探討普通話的教學與研究。

與此同時，普通話教材的研發與出版也積極配合澳門普通話的推廣工作。澳門回歸前後有一批普通話培訓教材出版。最近十年裏，普通話培訓教材的大量出版反映出普通話在澳門得到了人們的重視，這推動了相關教材的研發與出版。綜合性的教材有程祥徽編著的《普通話課程》(1982)，何廣中編著的《普通話津梁》(1997)，黃翊編著的《普通話進階》(1997)，以及教育暨青年局出版的《普通話教材(初級)》(2000)，《普通話教材(中級)》(2002)，《普通話教材(高級)》(2004)等。

同時出版的有一批針對性強，講究實用的普通話教材。如澳門理工學院一直致力於普通話教材的研發，並已經出版了《工科普通話教材(初級)》(2005)，《物業管理實用普通話初級培訓課程》(2005)，《零售業實用普通話初級培訓課程》(2006)，《室內裝修設計應用普通話(短期培訓課程用)》(2006)等。澳門旅遊學院也出版了一系列普通話教材，如《職業司機普通話》(2005)，《零售業從業員普通話(初級)》(2006)，《零售業從業員普通話(中級)》(2006)等。

此外，由澳門理工學院和澳門旅遊學院合作運營的澳門旅遊博彩技術培訓中心也出版了一系列普通話教材，如《娛樂博彩業實用普通話》(2003)，《旅遊博彩業普通話高級教程》(2006)，《娛樂場保安員普通話》(2007)，《會展工作人員實用普通話》(2007)等。

#### (六) 澳門高等院校的積極推動作用

澳門的高等院校在推廣普通話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為例，澳門大學在推廣普通話的活動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澳門大學普通話辯論隊。澳門大學普通話辯論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80年代，當時的東亞大學(澳門大學的前身，成立於1981年3月，1988年由澳門政府主導的澳門基金會收購同時重組為公立大學，並於1991年改稱澳門大學)普通話辯論隊獲邀參加了首屆亞洲大專辯論會。現在的澳門大學普通話辯論隊正式成立於2001年。除了參加國際大專辯論會、亞太大專華語辯論公開賽、中國全國大專辯論會等國際、全國和區域比賽外，澳門大學普通話辯論隊也積極開展了與中國內地高校之間的各種友誼賽，十年來澳門大學普通話辯論隊取得了眾多的榮譽。此外，澳門大學普通話辯論隊更是積極地在澳大及本地區進行普通話和辯論的推廣工作。澳門大學普通話辯論隊積極到中學表演，以推廣普通話。澳門大學學生會內地學生會也積

極地在澳門大學進行普通話的推廣工作，如2010年澳門大學學生會內地學生會舉行的“華之語·心之聲”——2010普通話推廣系列活動(4月6日-5月13日)活動豐富多彩，如“我只迷戀歌”——普通話K歌大賽，“普度眾聲”——普通話配音大賽，《暗戀桃花源》——普通話話劇展演，話劇《戀愛的犀牛》，這些都有力地推動了普通話在澳門大學以及全社會的普及與推廣。澳門理工學院在推廣普通話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李長森介紹了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在回歸前後培訓普通話所做出的貢獻。例如“高峰時期，語言暨翻譯學校為政府部門開辦的普通話(漢語)培訓班每年都招收學生兩千人以上，分別在幾十個不同程度的百多個班級內學習。既有對華人的初、中、高級的普通話口語班及提高班，亦有對土生葡人及其他外國人的聽說讀寫漢語班，甚至開設了專門培訓廳級以上澳門土生官員的主管班。”<sup>17</sup>

趙永新詳細介紹了理工學院與行政暨公職局及其他政府部門合作開展了對公務員的普通話和漢語的培訓及教學工作，並着重介紹了澳門理工學院在回歸後所採取的一系列舉措，旨在推廣普通話，如：舉辦教師培訓班；舉辦有關語言、普通話及文化方面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講座；開辦“普通話朗誦藝術培訓班”；“普通話表演比賽”活動等等，這都有力地推動了普通話在澳門的普及。<sup>18</sup>此外，澳門理工學院於1998年在語言暨翻譯學校設立了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並開展了普通話水平測試和漢語水準考試工作。澳門大學也於2001年成立了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普通話在澳門推廣也存在着一些問題與障礙。首先，雖然基本法規定中文為澳門的官方語言，但是對於普通話和粵語的具體地位並沒有做進一步的規定，而國家語委也曾表示不會主動向港澳地區推廣普通話。<sup>19</sup>這使得長期以來人們對於哪種語言或方言是官方語言存在着爭議。<sup>20</sup>其次，澳門地處粵語區，毗鄰香港，粵語文化歷史悠久，2010年“推普廢粵”和“粵語保衛戰”事件表明廣大民眾對粵語有強烈的情感。這使我們意識到普通話的推廣不能急於求成，需要使人們認識到推廣普通話並不是要消滅粵語，需要處理好普通話和粵語的關係，同時我們在規定授課語言為何種語言的時候，也需要處理好普通話和粵語、英語和葡語的關係，根據實際情況將普通話定為授課語言，或為必修課，或為選修課。

## 五、結語

本文主要討論普通話在澳門的發展歷史及其使用現狀，以及澳門社會普通話熱的原因以及普通話在澳門推廣面臨的一些問題和障礙。對於普通話在澳門的研究，我們認為存在以下的不足：首先，目前尚缺乏普通話在澳門擴散模式的研究，我們對於年齡、性別、社會階層、民族、家庭、社會網絡等多個因素對普通話在澳門擴散的影響還缺乏實證研究。例如在本研究中，我們主要利用宏觀和中間層次的調查結果對普通話在澳門的使用情況進行描述與原因分析，缺乏進一步的統計分析。<sup>21</sup> 其次，目前有關澳門普通話的特點的研究並不多，我們可以對澳門普通話學習者的口語能力發展的特點與規律從語音能力發展、詞匯能力發展、句法能力發展、話語標記使用能力變化等多角度進行研究，發現澳門普通話學習者口語的流利性、複雜性、多樣性和準確性的變化及其變化模式。我們還可以對澳門普通話進行變異研究、母語遷移研究(包括正向遷移和負向遷移)以及石化研究，等等。第三，有關普通話和澳門各方言(主要是粵語)的關係問題，目前的研究偏向於宏觀層次的分析，而微觀層次的研究並不多，缺乏個案研究和系統研究，而以往的研究大多關注粵語對葡語或者葡語對粵語的影響，有關普通話對澳門的粵語影響的研究並不多見。這需要我們改變研究視角，採用新的研究方法。例如郭駿提出方言與標準普通話之間的發展變化模式為原有方言－普通

地方話－地方普通話－標準普通話<sup>22</sup>，目前還沒有學者研究澳門粵語向普通話靠攏的演變方向、演變模式和具體表現。此外，Kachru的世界英語的三大同心圓模式(three concentric-circle model)將使用英語的國家劃分為內圈(inner circle)國家(如英國、美國等等)，外圈(outer circle)國家(如新加坡、印度等等)和擴展圈(expanding circle)國家(如中國、日本等等)<sup>23</sup>，我們可以參照這一模式來研究澳門普通話。<sup>24</sup> 此外，我們需要從多角度對影響澳門的普通話學習者的因素進行實證研究，這些因素包括內在因素(學習態度、學習風格、學習策略、自我效能感)，外在因素(教師、教育技術、同輩群體、學習環境、社會文化)，我們也需要關注普通話教師的研究，如普通話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識的建構、教學基礎理論、課程與課堂活動的設計與實施、教學策略、教材的設計與使用等等。同時，在推廣普通話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注意如何借鑒各種語言學習認知理論(如中介語理論、建構主義理論、認知信息處理理論、認知神經科學理論等等)和語言學習社會文化理論(如互動理論、任務型學習理論、文化適應理論等等)。

隨着 1999 年澳門的回歸，澳門社會經濟與城市發展日新月異，普通話為澳門的騰飛插上了一對翅膀，而回歸後的澳門為普通話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平台，我們有理由相信澳門這朵盛世蓮花更加光彩熠熠，令人矚目，綻放出更加絢爛的花朵，澳門的明天會更好。

## 註釋：

- <sup>1</sup>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07年，第282頁。
- <sup>2</sup> Mann, C. and W. Gabriella (1999).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Education: A survey from Macao on it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23/1, 17-36.
- <sup>3</sup> Young, M.-Y. C. (2009). Multilingual Education in Maca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6/4, 412-425.
- <sup>4</sup> 程祥徽：《澳門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與實現》，載於《中國語文》，第1期，1992年，第20-25頁。
- <sup>5</sup> 梁淑雯：《淺談“一國兩制”下澳門的語言發展》，載於《“一國兩制”研究》，第8期，2011，第138-146頁。
- <sup>6</sup> 蔡珮玲主編：《口述歷史：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澳門：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澳門歷史學會、錄像空間，2005年。
- <sup>7</sup> 盛炎：《澳門語言的歷史，現狀，發展趨勢與未來的語言政策》，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04年，第29-30頁。
- <sup>8</sup> Nortier, J. (2008). Types and Sources of Bilingual Data. In W. Li and M. G. Moyer (Eds.). *The Blackwel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in B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ism*.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35-52.
- <sup>9</sup> 見 Bacon-Shone, J. and K. Bolton (1998). Charting Multilingualism: Language Censuses and Language Surveys in Hong Kong. In M. C. Pennington (Ed.), *Language in Hong Kong at Century's En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43-90;

- Bacon-Shone, J. and K. Bolton (2008). B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ism in the HKSAR: Language Surveys and Hong Kong's Changing Linguistic Profile. In K. Bolton and H. Yang (Eds.),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5-51; 程祥徽：《新世紀的澳門語言策略》，載於《語言文字應用》，第1期，2003年，第19-26頁；劉鎮發、蘇詠昌：《從方言雜處到廣府話為主：1949-1971年間香港社會語言轉用的初步探討》，載於《中國社會語言學》，第1期，2005年，第89-104頁。
- <sup>10</sup> 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報告》，澳門：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2007年。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報告》，澳門：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2009年。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澳門大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報告》，澳門：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2009年。
- <sup>11</sup> 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報告》，澳門：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2007年，第11頁。
- <sup>12</sup> 黃漢強、程惕潔：《新來澳定居之內地移民論析》，澳門：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05年。
- <sup>13</sup> 陸鏡光、張振江：《近五十年來廣東地區語言變遷大勢》，載於《中國社會語言學》，第1期，2003年，第127頁。
- <sup>14</sup> 同上註。
- <sup>15</sup> 程祥徽：《澳門之推普策略種種》，載於《澳門理工學院學報》，第2期，1998年，第191-196頁。
- <sup>16</sup> 同註7，第28頁。
- <sup>17</sup> 李長森：《百年老校，十年騰飛：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十年發展回顧兼紀念澳門回歸祖國十週年——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史研究之四》，載於《澳門理工學院學報》，第4期，2009年，第75頁。
- <sup>18</sup> 趙永新：《回顧與展望——紀念澳門理工學院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成立五週年》，載於《澳門理工學院學報》，第1期，2003年，第17-24頁。
- <sup>19</sup> 《不會主動在港澳推廣普通話》，載於搜狐新聞網：<http://news.sohu.com/20060906/n245182196.shtml>，2011年9月21日。
- <sup>20</sup> 同註4、註5。
- <sup>21</sup> 張璟璋、徐大明：《人口流動與普通話普及》，載於《語言文字應用》，第3期，2008年，第48-52頁。
- <sup>22</sup> 郭駿：《方言變異與變化：溧水街上話的調查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 <sup>23</sup> Kachru, B. B. (1985), Standards, Codific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ism: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Outer Circle. In R. Quirk and H. G. Widdowson (Eds.), *English in the Worl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30.
- <sup>24</sup> 徐大明、王曉梅：《全球華語社區說略》，載於《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2期，2009年，第132-137頁。